

英语动结式研究:现状与反思

北京大学 胡旭辉

提要: 本文将英语动结式的研究综述置于论元理论的宏观背景下, 将动结式研究分成三类, 即语义解析、事件分解模式和复杂谓词模式, 并对此三类研究分别进行综述及批判性分析。在此基础上, 本文采用 Chomsky (2013, 2014) 的标签算法解决两个谓词在一个事件结构内的句法合并问题, 并在 Borer (2005a, b, 2013) 的新构式模式框架内, 基于狭义句法与概念-意向界面的互动特征提出论元允准准则, 并以此分析英语动结式论元关系的内在制约。

关键词: 英语动结式、综述、反思、标签算法、新构式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6)06-0841-13

1. 引言

在生成语言学的管辖约束 (Government and Binding) 阶段 (Chomsky 1981), 论元结构是底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最简方案 (Minimalist Program) 阶段 (Chomsky 1995, 2000), 底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surface structure) 被取消, 因此论元结构的投射问题在 Chomsky 最简方案的技术操作中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参见 Chomsky 2013, 2014)。然而撇开最简方案的技术细节, 论旨角色的来源及论元结构的句法投射在任何语法理论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要了解生成语言学框架下论元理论的各自特点、问题及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观察各类模式都重点研究的具体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 综述和探析英语动结式的相关问题。英语动结式涉及两个谓词, 展现出有别于单一谓词的复杂论元关系, 对此结构的回顾和反思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前句法理论背景下的论元理论。

2. 英语动结式的研究焦点

2.1 论元结构与动词限制

动结式结构上的特点是在一个单一的小句(mono-clausal sentence)中存在两个谓词, 其中一个是动词, 也称为主谓词(primary predicate), 另一个是形容词或者介词短语, 称为次谓词(secondary predicate), 如例(1)所示:

(1)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1)中的 hammer 和 flat 分别为句子的主谓词和次谓词。动结式一般会表达致使意义, 其中主谓词表达致使的动作, 次谓词表达致使结果的状态。

英语动结式论元结构的复杂性体现在两方面。首先, 宾语名词¹与动词之间的论旨关系(thematic relation)比较松散。如果主谓词是及物动词, 有时候两者之间有论旨关系, 比如例(1)中 the metal 是 hammer 这个动作的主旨(theme)。但有的句子中及物动词与宾语之间没有论旨关系, 如例(2)中 his throat 不可能是 sing 的主旨。

(2) John sang his throat sore.

如果主谓词是不及物动词, 则动词与宾语之间没有论旨关系, 例如:

(3) John ran his sneakers threadbare.

例(3)的意思是“John 的跑步行为导致运动鞋破了”。动词 run 表“跑步”义时一般是不及物动词, 但在动结式中却可以带一个宾语, 而且这个宾语与该动词没有直接的论旨关系。

尽管宾语与动词的论旨关系不确定, 但宾语与次谓词之间却有固定的论旨关系, 这就是直接宾语制约(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DOR)(Simpson 1983)。以上所有例子中, 宾语都是次谓词的主旨。这与同样带有两个谓词的描述式(depictives)形成对比:

(4) a. John ate the meat raw.

b. *John ran his shoes threadbare.

以上描述式中, 如果动词后带有宾语, 则动词必须是及物动词, 并且宾语必须是该动词的论元。因此(4b)中的不及物动词 ran 如果要表达描述式的意义“John 穿着破鞋跑步”则不合语法。

2.2 致使意义

尽管动结式的一大语义特征是致使意义, 但致使意义在某些英语动结式中

可以缺失,例如:

(5) a. Reluctant to let him go, the audience clapped the singer off the stage. (Borer 2005b: 225)

b.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Parliament building, the crowd cheered the huge gates open. (同上)

(5a)中,观众鼓掌并不是致使歌手下台的原因,歌手只是在掌声中下台。同样(5b)中大门打开也不是人群的鼓掌导致的。

3. 相关研究综述

有关英语动结式的研究非常丰富,本文仅综述生成语言学框架内各模式的代表性研究,以此分析英语动结式的研究现状,并展示目前生成语言学有关论元结构的主要研究模式。

3.1 语义解析

“语义解析”是指用语义规则对动结式做出语义描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深层次的解释。Rothstein (2000, 2003, 2004)是这类研究的代表。Rothstein认为动结式和描述式都包含两个事件。在Rothstein的分析中,“部分关系”(PART-OF relationship)是带有双谓词结构(包括动结式和描述式)的特征,指某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的一部分。部分关系能够实现的前提是两个事件共享一个论元:

(6) 如果涉及两个事件 e_1 和 e_2 的语法关系 Δ 引入了部分关系 PART-OF (e_1, e_2),那么 Δ 必须让 e_1 和 e_2 同时共享同一个论元。(Rothstein 2000:249)

描述式与动结式的差异在于两者带有不同类别的部分关系,具体如下:

(7) 描述式: $\lambda e. \exists e_1 \exists e_2 [e =^s (e_1 \cup e_2) \wedge \text{PART-OF}(e_1, e_2)]$

动结式: $\lambda e. \exists e_1 \exists e_2 [e =^s (e_1 \cup e_2) \wedge \text{PART-OF}(\text{cul}(e_1), e_2)]$ (同上:253)

根据(7),描述式和动结式都表达了一个总体事件(即 e),该事件是两个分事件的总和(即 s)。对于描述式例(8)来说,由部分关系建立联系的两个分事件分别是主谓词和次谓词做谓语的事件(“John 吃肉”和“肉是生的”),并且“John 吃肉”事件是“肉是生的”事件的一部分。

(8) John ate the meat raw.

与描述式不同的是,动结式如例(9)的部分关系不涉及主动词做谓语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主动词所传达的动作的终点(culmination point)(“Mary 漆房

子”)与次谓词所传达的状态(“房子是红色的”)之间,并且“Mary 漆房子”事件的终点是“房子是红色的”事件的一部分。

(9) Mary painted the house red.

以上表征潜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动结式的主动词所代表的事件都有终点。Rothstein (2003, 2004)的解决办法是,假设动结式的生成过程中有一个操作是增加一个终点修饰函项(function of culmination modifier):

(10) $\lambda E \lambda e. E(e) \wedge \exists e' [Cul(e) = e' \wedge Arg(e') = Th(e)]$ (Rothstein 2004: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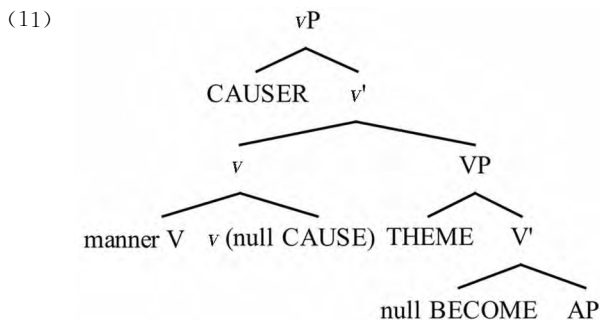
终点修饰函项会给一个没有终点的活动事件增加终点,使其成为一个完成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并且强制要求 e' 的论元与 e 的主旨论元是同一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及物动词在动结式中可以带宾语:终点修饰函项要求终点事件的论元必须等同于主动词所表达事件的主旨论元,因此终点修饰函项实际上也具备给动结式中的不及物动词增加论元的功能。

但是,Rothstein 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一些重要的语义要素很难在句法推导中找到源头。Rothstein 的分析依赖于两个重要的语义要素,即部分关系和终点修饰,这样的语义在最简方案的句法推导中并没有源头。

3.2 事件分解模式

由于动结式的语义描述总是包括两个事件,因此认为动结式的句法推导中也编码了两个事件的操作显得非常自然。这类研究一般采纳的是生成语言学框架内的新构式主义模式(neo-constructionism)(Borer 2005b:10),强调论旨角色由句法负责。我们将这类研究称为事件分解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进行的动结式句法研究非常丰富(如 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01; Folli & Harley 2004, 2006; Embick 2004; Mateu 2005, 2012; Ramchand 2008),本节扼要分析其主要特征。

事件分解模式下动结式的句法结构大致如下:



这个模式的优点是将事件分解的语义分析非常精确地投射到了句法结构中。按照这个模式的分析,句法结构编码了致使和状态变化两个事件。致使事件的核心词是轻动词(light/little *v*),具有致使意义,但没有语音形式(null CAUSE)。状态变化词组(VP)的核心词V是一个无语音形式的BECOME。状态变化事件被CAUSE选择,在语义上则表现为状态变化是CAUSE的结果。动结式中的宾语在[Spec VP]位置,表明宾语是状态变化的主旨论元,因此宾语与次谓词之间一定存在论元关系,这就解释了DOR的动因。动结式的主语在[Spec *v*P]位置,因此该名词获得的是致使者(causer)或者施事(agent)角色。主动词并入(incorporation)到轻动词的位置,给致使事件提供具体的方式或者给事件的谓语命名(Harley 2005)。

尽管事件分解符合动结式的语义解读,但动结式的句法结构编码两个事件还存在问题。我们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12)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automatically.

(13) a. * John hammered [_{VP}[_{VP}the metal flat] automatically].

b. John [_{vP}[_{vP}hammered [_{VP}the metal flat]] automatically].

按照(11)的句法结构,automatically可以修饰BECOME事件或者CAUSE事件。也就是说,(12)可以有(13a)“John的锤打使得铁块自动变平”和(13b)“John自动锤打使得铁块变平”两个可能的解读。但(13a)的解读并不能被接受。

事件分析模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谓词的选择问题(Neeleman & van de Koot 2003)。上文已经指出,这个模式认为表达状态变化事件的VP是轻动词选择的补足语。由于方式动词可以嫁接到轻动词*v*,从形式上来看,表达状态变化事件的词组处于方式动词的补足语位置。如果这个分析正确,我们可以预测方式动词后也应该可以选择TP或者CP,只要确保TP/CP表达的是状态变化即可。

(14) * John hammered *that the metal became flat*.

按照事件分析模式,例(14)中方式动词hammer嫁接到轻动词位置,补充致使事件的方式信息。这些句法操作无论在语义还是句法层面都是事件分解模式所允许的,但例(14)这样的句子完全不合语法,这进一步表明该模式还存在问题²。

第三个问题是致使意义的来源。按照事件分解模式,致使意义的来源在于句法结构中表达致使意义的轻动词。如果这样的模式是正确的,那致使意义必须要出现,而不应该出现例(5)中致使意义缺失的情况。

3.3 复杂谓词模式

复杂谓词(complex predicate)视角下的研究认为,动结式在句法中只编码一个事件,两个谓词合成后成为一个单一的复杂谓词,即单一的动结式事件的谓词。复杂谓词视角下的代表性研究是 Neeleman & van de Koot(2003)。

Neeleman & van de Koot(2003)的理论取向是词汇主义,即认为谓词自带论元结构信息。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在动结式的生成过程中,两个谓词各自的论元结构融合(integration)成单一的论元结构,这个过程大致可以通过(15)、(16)来展示:

$$(15) \quad \begin{array}{c} V \{ \langle \theta_y \langle \theta_x \rangle \rangle | \lambda x \lambda y [{}_e y [{}_s x]] \& y = I \} \\ \swarrow \quad \searrow \\ A \{ \theta_x | \lambda x [{}_s x] \} \quad V \{ \lambda y [{}_e y] \} \end{array}$$

John ran his sneakers threadbare.

$$(16) \quad \begin{array}{c} V \{ \langle \theta_y \langle \theta_{x/z} \rangle \rangle | \lambda x/z \lambda y [{}_e y [{}_s x/z]] \& y = I \} \\ \swarrow \quad \searrow \\ A \{ \theta_x | \lambda x [{}_s x] \} \quad V \{ \lambda z \lambda y [{}_e y [{}_s z]] \} \end{array}$$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在(15)中,V代表的是一个非作格动词(即只带一个施事的不及物动词),A(adjective)代表形容词,e(event)代表动态事件,s(state)代表静态的状态,I(initiator)代表事件触发者(施事)。两个谓词各自所带的论元结构在V的第一个投射点融合,使得A的论元结构嵌入到V的论元结构中,得到一个新的论元结构。在新的论元结构中,施事来自于V,主旨来自于A,获得的解读是:施事y触发的事件e导致了以x为主旨的状态s。这样,V与A形成一个单一复杂谓词,该复杂谓词有自己的论元结构,在句法推导过程中负责指派论元。

(16)的模式与(15)基本一致,差异在于(16)中的V是及物动词。Neeleman & van de Koot(2003)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及物动词V的主旨论元z与形容词A的论元x成为同一个论元,图中x/z即体现这一点。

复杂谓词的视角与事件分解相比有两个优点:1)由于没有假设每个谓词代表一个事件,这类研究因此避免了(13)所暴露的问题;2)由于这类研究中两个谓词并不是各自独立指派论元,因此也避免了上文指出的“选择性问题”。这类研究是建立在一些额外的词汇规则基础上的,比如两个谓词的论元结构的融合;一个谓词的论元结构必须嵌入另一个论元结构中;及物动词与形容词的主旨论元在融合中必须由同一个名词同时承担。以上规则并不属于普遍的句法推导原则,因此这些原则的具体来源及合法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4. 有关动结式研究的反思

在本节,我们将基于前文的分析做出反思,提出一些初步的假设。我们的目标不是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解释来解决所有动结式研究涉及的问题,而是针对前文指出的不足,结合当前最新的生成语言学相关理论,对一些取向不同的生成语言学框架下的研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4.1 “标签算法”与动结式的谓语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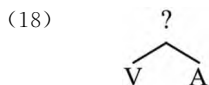
第三节已指出,生成语言学视角下的新构式主义和词汇主义框架下的动结式研究目前都存在问题。新构式主义采纳的事件分解模式将两个谓词看作两个事件所带的谓词,但我们已指出,动结式等致使结构事实上只投射一个单一的事件³,这就意味着两个谓词隶属于同一个事件。根据此设想,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单一事件的两个谓词在句法运算中如何合并?采用词汇主义的视角,可以为两个谓词合成单一的谓词提供具体的构词原则。但复杂谓词模式也进一步凸显了词汇模式有待解决的问题:复杂谓词的分析模式需要独立设置多个规则。即使我们采纳 Reinhart & Siloni(2005)的理论,认为论旨角色是动词自带的特征,也无法在句法推导中找到论元结构融合及嵌入等操作的来源。因此,无论采用新构式主义还是词汇主义的框架,在最简方案阶段,动结式的研究都必须解决主动词和次谓词是如何参与到一个单一事件的句法结构的推导中来的。

我们认为,Chomsky(2013, 2014)有关“标签算法”(labelling algorithm)的最新理论可以为以上问题提供较合理的解决方案。“标签算法”涉及重新审视很多重要的句法操作,如 EPP、移动的动机等等,本文不具体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在此仅分析该理论的要点,并以此来解释动结式谓词的句法表现。根据“标签算法”,如果一个句法对象需要获得解读,必须要有一个标签(如 V, N, *v*P, DP, CP 等)。获得标签的方法有几类:一类是如果一个核心词(head)选择另外一个对象合并,则核心词的特征投射成为标签。比如当 T 与 *v*P 合并,由于 *v*P 是被核心词 T 选择,因此 T 特征投射,成为合并后的句法成分的标签,即 TP。当两个合并的成分 X/Y (或者 XP/YP)不存在选择关系,也就是当对称性合并(symmetric merge)出现时,获得标签的方法有两类。第二类是 X 和 Y 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在此情况下该共同特征投射成为合并后句法成分的标签。如例(17)中,CP 与 what 合并时并不存在选择关系⁴,因此不能找到核心词来投射特征以获得标签。但 CP 和 what 都具备 Q-特征(疑问特征),因此 Q-特征投射成为合并而成的句法成分的标签。

(17) I wonder [CP what_i[_C C [John bought t_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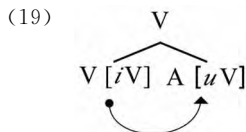
另一类获得标签的方法是“移位”：当 X 和 Y 合并并且不存在选择关系，而且两者没有共同的特征，此时移动 X 或者 Y。如果将 X 移动出来，则 Y 的标签就是合并后句法成分的标签。

我们再回过来看动结式。如果我们认为动词和形容词合并并在单一的事件结构中，在目前的标签算法理论下则有一个难题：合并以后的句法成分的标签是什么。



表面上看，(18)中 V 和 A 没有共同特征，因此无法通过投射一个共同特征来获得标签。我们初步假设如下：所有谓词要成为合法的事件谓词，必须获得可解的动词特征（ $[iV]$ 特征），因为可解的动词特征是与 T 合并获得时特征（ $[iT]$ ）的前提⁵。按照这个假设，V 与 A 合并时，V 带有 $[iV]$ 特征，A 带有不可解 $[uV]$ 特征，因此 V 是核心词，给 A 的 $[uV]$ 特征赋值，V 成为合并结果的标签，而 A 也因此获得 $[iV]$ 特征。我们提出此假设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理论上的理由。命题中的事件必须要被定位在时间中，因此事件的谓词必须获得 T 特征（Higginbotham 2000）。第二个理由来自英语语言事实：我们知道，英语中如果一句话中没有动词谓词而只有形容词谓词，则需要带有动词特征的系动词 be⁶（如 *John happy vs. John is happy）。

按照以上假设，动结式的主动词和形容词的合并如下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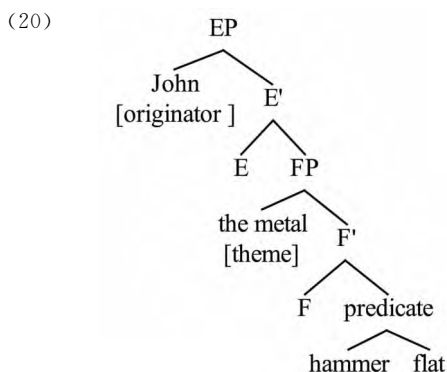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如果动词与形容词合并可以获得 V 的标签，需要解释为什么动词与形容词以独立词形式出现，而没有构成一个单一的词。与最简方案的其他基本操作一样，标签算法理论下的“合并”并不必然带来并入；本质上，是否并入是语音形式（PF）层面上的问题。比如在 DP 结构中，D 与 N 的合并本质上与 (19) 一致，即 N 有一个不可解的 $[uD]$ 特征，因此与 D 合并后标签是 D 而不是 N。但是在英语这样的语言中，功能语素 D（如 the）不是“黏着语素”，不需并入名词成为一个单一词语，甚至 D 与 N 可以被其他成分隔离（如 the smart boy）。当然，为什么某些合并会带来并入，而有些则不会，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Rizzi (2016) 在标签理论的框架下给出的一个假设是，如果一个核心词带有一个 lex 特征，并且这个特征在合并后继续投射，则合并的结果为单一词汇。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展开具体讨论。

4.2 动结式与论元理论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由于一个单句带有两个谓词和两个论元,动结式的论元关系相对其他结构更为复杂,因此可以说是论元理论的“试金石”。如果我们采纳 4.1 节的动结式生成模式,那么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的论元指派情况。本小节聚焦于基于 4.1 节句法推导基础的论元关系。如果按照词汇主义的模式,则 3.3 节介绍的 Neeleman & van de Koot (2003) 的研究是目前最为合理的模式。如果采纳目前主流的新构式框架(Borer 2005 a, b, 2013; Ramchand 2008, 2013; Marantz 2013),即论元由功能结构负责,则需要重新审视如何构建动结式的论元关系⁸。目前新构式理论中对论元关系做出最为精细解读的研究是 Borer(2005a, b, 2013),该研究认为编码事件的功能结构 EP(event phrase)有两个固定的论元位置,指派触发者(originator)和受事/主旨的论旨角色。尽管该模式在 Borer(2005a, b, 2013)的研究中涉及了许多问题,但该模式依然不能解决两个谓词情况下的论元关系安排。本小节以 Borer 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新构式句法框架下的论旨关系的制约机制,并以此分析动结式的论元与谓词之间的关系。

按照 Borer 的框架及本文认为英语动结式只编码一个事件的假设,动结式的结构大致如下:



限于篇幅,本文不具体介绍 Borer 理论的技术细节。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Spec EP]位置的名词获得“触发者”的论旨角色, [Spec FP]位置名词获得“主旨”角色。谓词的初始合并位置也是固定的,即(20)中的 predicate 位置,大部分动结式将两个谓词合并在此,即 hammer 和 flat。两者合并后标签的问题在 4.1 节已经解决。此外,动词在之后的推导中,将进一步移动到 E 位置。句法结构并不明确 John 一定是 hammer 事件的触发者,也不明确 the metal 一定是 hammer 或者 flat 的主旨论元。这是因为谓词并无语法信息,其词汇语义只在

逻辑式(LF)层面介入。因此,我们需要一套规则,可以让句法推导的论旨角色在 LF 层面与谓词的词汇语义兼容。我们假设这套规则为“论旨允准条件”,大致如(21)⁹:

(21) 论旨允准条件:

在 LF 层面(即后狭义句法(post-narrow syntax)阶段):

- a. 一个合法的事件参与者 X 允准至少一个事件谓词;
- b. 一个事件谓词必须至少被允准一次;

“允准”的定义:在世界知识层面,谓词语义能与事件角色兼容。

以上假设的基本出发点与 Borer(2005b)的精神一致,即论旨角色由句法决定,谓词不参与句法层面的论元指派。本假设进一步明确了在后句法阶段,谓词的词汇信息如何与句法推导出的语义合并。根据以上假设,在(20)中,两个谓词 hammer 和 flat 需要接受“触发者”和主旨论元的允准。由于 flat 的词汇语义是静态的,无法与“触发者”角色兼容,因此允准该谓词的角色只能是“主旨”论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语动结式的宾语与次谓词的论旨关系是强制性的,即前文提到的 DOR 制约。同样,“触发者”也只能允准动态谓词 hammer,因此我们得到的解读为 John 是“捶打”这个动词的发起者。按照(21)的条件,只要世界知识允许,一个论旨角色可以允准不止一个谓词。在(20)中,主旨论元必须要允准 flat,因为 flat 作为静态谓词不能被另外一个论旨角色“触发者”允准。但是主旨论元 the metal 本身也可以允准动态动词 hammer,即这个铁块是“捶打”动作的承受者(无论是否有允准关系,都不违反条件,因为 hammer 已经获得了“触发者”论元的允准)。这个预测确实也符合事实。以(21)为例,尽管大部分情况下,“铁块”是“捶打”的承受者,但只要有语境支持,这个关系可以缺失。假设如下语境¹⁰:John 需要通过某台机器来压平铁块,而发动这台机器的前提是反复击打某个零件给机器充电。在这个语境下,(20)中的宾语 the metal 并不是 hammer 的捶打对象。笔者采访的英语本族语者都能接受这样的解读。也就是说,按照(21)的条件,动结式的宾语与主动词之间的关系不是强制性的,关键看世界知识是否允许这样的论旨关系。这也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英语动结式允许宾语与主动词没有论旨关系(如前文例(2)、(3))。

(20)中的句法结构以及基于(21)所分析的论旨关系中并没有涉及致使意义。按照这样的分析,(20)获得的语义大致如下(如下语义是将 the metal 当作主旨论元):

(22) $\exists e$. [hammer (e) & BECOME flat (e) & THEME (the metal, e) & ORIGINATOR (John, e)]

即:在同一个事件中,John 捶打铁块并且铁块变平。由于“捶打”和“铁块变平”是在同一个事件也即同一个时间范围内,最直接的语用推理是“铁块变平是由捶打导致”。由于“致使意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我们可以预测,在特殊语境支持下,某些动结式可以没有“致使意义”,这正是上文(5a)和(5b)展示的情况。Neeleman & van de Koot (2012)指出,人类需要表达“致使”意义,但这个意义并不是通过某个特定的谓词或者仅仅依靠句法推导来表达,而是需要同时借助其他非句法推导的手段。本节有关动结式的致使意义来源的假设与这个结论一致。

5. 结语

通过对英语动结式研究的综述,我们希望达到以下目的:1)展示目前动结式研究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及未涉及的研究点,为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能的便利;同时也通过总结动结式的研究来展示目前有关论元结构的主要研究思路。2)在分析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相关理论,为各类动结式研究都有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初步的思路。与以往的回顾不同,本文将动结式研究置于论元理论和目前最新的句法理论的大框架下,总结出动结式研究对句法理论的宏观启示。动结式研究涉及的点很多,相关的理论问题也比较复杂,本文的讨论难免存在疏漏,期待同行能够进一步补充相关论述,提出批评。

注 释

1. 与其他英语动结式研究一样,“宾语”在本文中是一个方便描述的术语,指代动结式中跟随动词的名词,如例(1)中的 the metal。
2. 分析动结式的另外一个模式,即小句模式(small clause approach)(Hoekstra 1988)也存在同样问题(Neeleman & van de Koot 2003)。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动结式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全面否定小句模式,而只是表明动结式不属于小句模式所涵盖的句法结构,比如不同于 John considers Mary intelligent 这样的句子结构。由于小句模式与新构式模式有颇多类似之处,问题也比较相同,限于篇幅,本文不具体讨论小句模式。
3. Horvath & Siloni(2011)及 Alexiadou(2010)也认为致使结构只映射一个事件。
4. 需要注意的是,在 Chomsky(2014)的分析中,what 并不是移动到 CP 的标志语位置而成为 CP 的一部分,what 和 CP 各自为独立的句法成分。
5. 相关讨论参见 Panagiotidis(2011)。
6. 汉语可以直接由形容词做谓语,但 Grano(2011)指出,汉语形容词一般情况不能单独出现而需要一些限制,如需要“很”的修饰,Grano 指出这些限制内在的原因也与 T 特征有关。另外,英语 ECM 结构小句中的形容词谓语(如 John considered Mary smart)的动词性特征可能来源是:通过“逆向一致”(inverse agree)(Biberauer & Roberts 2011; Biberauer & Zeijlstra 2012; Zeijlstra 2012),小句形容词获得主动词的动词性特征。
7. 图中的箭头代表的是 V 给 A 的[uV]特征赋值。

8.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由于取消了与论元结构相关的底层结构,最简方案框架下,一边合并一边指派论元角色。这在逻辑上确实符合最简方案的精神,也非常有新意。但目前在具体操作上,句法学家们还是在词汇主义(即动词带有论元结构的语法信息)与新构式(即普遍的功能结构指派论元)之间做出选择。本文篇幅有限,只能在目前这个理论趋势下(参见 Marantz 2013)进行回顾和反思。
9. 有关此假设的具体细节,可参考 Hu(2015, forthcoming)。
10. 该语境信息由 Ad Neeleman, Ian Roberts 教授向笔者提出,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Alexiadou, A. 2010. On the morphosyntax of (anti)causative verbs [A]. In M. Rappaport Hovav, E. Doron & I. Schel (eds.), *Lexical Semantics, Syntax, and Event Structure* [C]. Oxford: OUP. 177-203.
- Biberauer, T. & I. Roberts. 2011. Negative words and related express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some familiar puzzles [A]. In R. Ingham & P. Larrivee (eds.), *The Evolution of Negation: Beyond the Jespersen Cycle*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3-60.
- Biberauer, T. & H. Zeijlstra. 2012. Negative Concord in Afrikaans: Filling a typological gap [J]. *Journal of Semantics* 29: 345-371.
- Borer, H. 2005a. *Structuring Sense. Vol. 1. In Name Only* [M]. Oxford: OUP.
- Borer, H. 2005b. *Structuring Sense. Vol. 2.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M]. Oxford: OUP.
- Borer, H. 2013. *Structuring Sense. Vol. 3. Taking Forms* [M]. Oxford: OUP.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A]. In R. Martin, D. Michaels &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89-156.
- Chomsky, N. 2013. Problems of projection [J]. *Lingua* 130: 33-49.
- Chomsky, N. 2014. Problems of projection: Extensions [Z]. ms. MIT.
- Embick, D. 2004. On the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participles in English [J]. *Linguistic Inquiry* 35: 355-392.
- Folli, R. & H. Harley. 2004. Consuming results: Flavors of little-*v* [A]. In P. Kempchinsky & R. Slabakova (eds.), *Aspectual Enquiries* [C]. Dordrecht: Kluwer. 1-25.
- Folli, R. & H. Harley. 2006. On the licensing of causatives of directed motion: Waltzing Matilda all over [J]. *Studia Linguistica* 60: 121-155.
- Grano, T. 2011. Mandarin *hen* and Universal Markedness in gradable adjectives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30: 513-565.
- Harley, H. 2005. How do verbs get their names? Denominal verbs, manner incorpora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verb roots in English [A]. In N. Erteschik-Shir & T.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C]. Oxford: OUP. 42-64.
- Higginbotham, J. 2000. On event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A]. In J. Higginbotham, F. Pianesi & A. Varzi (eds.), *Speaking of Events* [C]. Oxford: OUP. 49-80.
- Hoekstra, T. 1988. Small clause results [J]. *Lingua* 74: 101-139.

- Horvath, J. & T. Siloni. 2011. Causatives across components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9: 657-704.
- Hu, X. H. 201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sultatives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Hu, X. H. forthcoming. *Encoding Events. Function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s, and Variations* (working title) [M]. Oxford: OUP.
- Marantz, A. 2013. Verbal argument structure: Events and participants [J]. *Lingua* 130: 152-168.
- Mateu, J. 2005. Arguing our way to the 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DOR) on English resultativ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8: 55-82.
- Mateu, J. 2012. Conflation and incorporation in resultatives [A]. In V. Demonte & L. McNally (eds.). *Telicity, Change and State* [C]. Oxford: OUP. 252-278.
- Neeleman, A. & H. van de Koot. 2003. Bare resultatives [J].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6: 1-52.
- Neeleman, A. & H. van de Koot. 2012.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causation [A]. In M. Everaert, M. Marej & T. Siloni (eds.). *The Theta System* [C]. Oxford: OUP. 20-51.
- Panagiotidis, P. 2011. Categorical features and categorizers [J]. *Linguistic Review* 28: 365-386.
- Ramchand, G. 2008. *Verb Meaning and the Lexicon* [M]. Oxford: OUP.
- Ramchand, G. 2013. Argument structur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alternation [A]. In M. den Dikk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C]. Cambridge: CUP. 265-321.
- Rappaport Hovav, M. & B. Levin. 2001. An event structure account of English resultatives [J]. *Language* 77: 766-797.
- Reinhart, T. & T. Siloni. 2005. The lexicon-syntax parameter [J]. *Linguistic Inquiry* 36: 389-436.
- Rizzi, L. 2016. Labeling, maximality and the head-phrase distinction [J]. *Linguistic Review* 33: 103-127.
- Rothstein, S. 2000. Secondary predication and aspectual structure [J].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17: 241-264.
- Rothstein, S. 2003. Secondary predication and aspectual structure [A]. In E. Lang, C. Maienborn & C. Fabricius-Hansen (eds.). *Handbook on Adjunct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53-590.
- Rothstein, S. 2004. *Structuring Events: A Study in the Semantics of Lexical Aspect* [M]. Oxford: Blackwell.
- Simpson, J. 1983. Resultatives [A]. In L. Levin, M. Rappaport & A. Zaenen (eds.). *Papers i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143-157.
- Zeijlstra, H. 2012.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agree [J]. *The Linguistic Review* 29: 491-539.

收稿日期:2015-09-07;修改稿,2016-10-18;本刊修订,2016-10-19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n perfect and experiential aspects (p. 803)

CHEN Qianr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Mandari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are taken as languages without perfect aspect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in which Dahl & Velupillai (2013) define perfect according to its resultative and experiential uses. This is inconsistent with typological studies of tense and aspect.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perfect aspect has five pragmatic uses, exhibited in five functional constructions in Beijing Dialect. This paper shows functional divisions of perfect aspect in the five constructions in semantic maps, which are more detailed tha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perfect aspect in Bybee *et al.* (1994) and more concise than the semantic space of perfect aspect in Anderson (1982).

Gene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number concept of English collective noun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conceptualization (p. 815)

QIN Yuxia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QIN Qianq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Collective nouns have the dual number concept of internal plural and external singular, which is generated from the dual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dual numerical feature of collective thing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umber concept of collective nouns includes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which are both the select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l plural and external singular of collective nouns. The singular form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ternal singular, and the plural form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l plural.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a symbolic 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number form and the number concept of English collective nouns, and suggests that there is no case in English where a singular noun expresses a plural concept or a plural noun expresses a singular concept.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engagement patterns in academic discourses of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 A case of “V+ that-clause” (p. 828)

ZHANG Jido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CHEN Xiaox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Martin's engagement in his Appraisal Theory and Hyland's study of the evaluative “that”, this paper make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ngagement pattern “V + that-clause” in academic discourses of BNCweb. Through the contrasts and analyses on its source, act, manner and stance and its role/position in the complement structure, the paper reveals the way these two different academic communities organize their discourses and find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en these two communities engage some voice into a “writer-reader” discourse.

Studies on English resultatives: Review and reflection (p. 841)

HU Xu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Locating the overview of the studies on English resultatives against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orie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ree types of studies on resultatives: semantic

analysis, event decomposition and the complex predicate. Based on this critical survey, this paper applies Chomsky's (2013, 2014) Labeling Algorithm to the account of merging a verb and an adjective within a single event structure an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guments and predicates in English resultatives, proposes within Borer's neo-constructional framework a new constraint on the mechanism of thematic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narrow syntax and C-I interface.

On Shakespeare's canonicity and cosmopolitanism (p. 854)

ZHA Mingjian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Regarded as the core of western literary classic, Shakespeare's works has transcended the bounda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become a cultural symbol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 for the entir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representations, applications, reconstructions and recreation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works has been incessantly regenerated, transformed, and proliferated. This process manifests many extraordinary qualities, such as canonicity, universality, adaptability, transcendency, modernity and multiculturality. Nevertheless, at the center of all these qualities is undoubtedly cosmopolitanism. Shakespeare's philosophical revelation of human nature epitomizes the maxim of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Man", and his "significant form" constructs a unique poetics characterized by "Shakespearization". By embedding the discussion and revelation of humanity in artistic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and exemplifying the concept of "significant for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onstructing his own "significant humanity" through a perfect integration of humanism,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Shakespeare's classic acquires its canonicity and demonstrates its cosmopolitanism.

"Dance-to-tune"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hakespeare's plays: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p. 866)

CHEN Guohua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DUAN S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Concerning word order in Shakespeare's plays, there are two diametrically opposite principles. Zhu Shenghao declares that he is ready to completely alter the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text in order to achieve clarity and fluency in the target text, while Bian Zhilin argues for the principle of "dance-to-tune" and line-for-line translation.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however, about how to deal with word order variations in translating Shakespeare's plays. Adopting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studying three types of unconventional order of clause elements in Shakespeare's dramatic text and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have found that Zhu did apply his principle in his translation while Bian actually failed to dance to the tune of Shakespeare's original texts. The only translator that has strictly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dance-to-tune is Peng Jingxi.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when both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orders of clause elements are available in both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if the playwright has adopted the latter for a particular rhetorical or dramatic effect,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y his or her best to dance to tune in order to achieve a similar effec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Recent currents in Shakespeare studi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p. 880)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016 witnesses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William Shakespeare with variou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round the world. Shakespeare studi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have thus been particularly brisk since 2000, generating a multitude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Behind this scholarship there are two opposing approaches, the historicist and the presentist, which arguably give rise to various topics of Shakespeare studies. This paper tries to survey these major topics in the hope of pinning down an array of Shakespeare scholars on global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and underscoring many new currents of contemporary Shakespeare studies in English.